

## 原文标题：**Construire par une négociation internationale un nouveau cadre monétaire, financier et énergétique**

### 通过国际协商建造货币、金融及能源新构架

#### 1、弄清楚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1、本次金融危机向人们揭示：全球性管理方面有缺陷。这已经不再是各国银行缺乏调控的问题。金融危机促使了欧盟联合行动。欧盟再次多亏了它为求发展而自设的不平衡而往前迈进。欧元固然给政治经济和税收的协调一致造成了困难。欧元区成员国都不愿意那样。而面对金融危机而必须协调行动的局面使各成员国改变了态度。同样，当我们采取重建信心的临时措施把火烧眉毛的事情解决后，就应该考虑寻求应对金融危机的中长期办法，改善全球性的管理。

2、全球性管理的格局应由世界几大地区来确定。这一次的金融危机后，世界已不再是原来的世界。1945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一半；而今天，则只占四分之一。在1944年举行的第一次“布雷顿森林”会议时，美国拥有足够的实力把美元作为世界性的货币，保证美元可以兑换成黄金。各种主要货币固定汇率，并定期协商重定。欧洲正是得益于这一稳定局面得以重建。到了2008年，这个时代终于结束。二战后金融危机首次发源于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金融的心脏给予双重打击：一是打击了美国和华尔街，二是打击了各大银行相互间的信心。因此，由世界四大地区组成的货币金融体系峰会应该应运而生，在这个智能经济时代发挥其关键作用。这世界四大地区是：欧洲（统一认识的欧洲）、美国、中国、印度。八国集团（G8）即使再扩大，也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形势。八国集团中有四国是欧洲国家。德斯坦总统倡议成立的六国集团（G6）及后来的七国集团（G7）在1975年的时候反映了当年的世界形势，有其存在的意义，但今天已经不同了。

3、要建立货币金融的全球性的管理体系，必须治“本”而不光是治“标”。过度的金融化主要有四个原因，而这四个原因都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

（1）金融化的突飞猛进起于1971年尼克松总统关于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决定。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决定，以及后来在80年代出台的所谓“3D政策”的不调控政策，给汇率投机提供了空间，同时也为企业回避汇率风险引出了一系列越来越精细的技术方法。如果世界各大货币不回归稳定汇率，金融化的程度就不可能降低。

（2）石油在货币金融调节及金融化的问题上起关键作用。TEP（吨标准石油）已成为一种真正的货币，是一种支付手段和记帐单位，这是因为化石能源在我们所有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已无处不用。石油和天然气的储备者俨然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银行，其“发行政策”可以左右经济活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创造出大量的需再投资的石油美元，给金融化的发展提供了第二波推动力。其后果是：货币问题与能源问题已经不可分离。世界的峰会不能回避能源问题。

(3) 发达国家老年化问题引起高储蓄。传统的养老保障是养儿防老：或直接的家庭援助，或间接的分配式养老。这一种平衡被打破后，需要寻找新的养老保障，于是，货币的保值功能便有了新的意义，要求创立全球范围的储金互助机制。目前，养老和互助基金高达15万亿美元，构成金融化的重要因素。从理论上说，这些基金最好用于长期投资。但金融化却把这些基金引向非创造就业的领域，引向不利于工作者的利益，那是一种短期效应，但长期效应才是最好的出路。全球性管理体系应给基金管理确立新的规定。

(4) 技术层面的进步导致货币金融的融合。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代码体系于1973年创立。这一体系在使银行间的转帐变得自动化和快速化的同时，使各国银行系统一体化。而且，和日后发展起来的化解长期风险的金融产品一起，它促成货币和金融的统一，也有助于把个人之间的关系及贷方和借方共同承担风险的关系转变为无数匿名的银行业务，把时间和空间都消解无形。次级贷款的“银行债权证券化”跟Kerviel综合症一样，将这种变形推向极至：金融家们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不用负责的世界中。

从上述因素可得出以下结论：全球性的协商应该涉及货币金融和能源。

4、在上述基本原因基础上，以下两种现象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化。

(1) 企业的股东们不甘心被排除在企业的技术操作以外。股东们以“经济民主”为名，力图表明他们才是企业真正的老板。“股东价值观”脱离真正的经济增长，片面地将企业的基金用于追求短期效益。“投机者”取代了企业家，公司的报表中，越来越看重金融收益，连非金融业的公司也如此。“股票期权”将企业高层跟其他员工隔离开来，经济全球化和生产过程信息化打破了福特制和战后实现的劳资之间的平衡，也打破了劳方内部不同等级之间的平衡。收入不均现象越来越严重，其原因并非是总收入中资本收入增加，而是在劳方内部产生了一个非常高收入的阶层，他们的收入由“市场裁决”决定。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扭转这一发展势头，收入要跟长期责任挂钩。

(2) 金融业终于找到了它自身的目的。金融系统开发了一系列的收支技术和方法，其受益者就是它自己。美国金融业的情况尤其明显。美国金融业的利润占企业总利润的比例，从1947年到1983年一直在15%左右浮动。而从1983年起，这一比例快速增长，现在已经高达30%左右。可以想象这一现象对经济的打击。金融业而不是财富真正的创造者占据上风的这一局面，必须尽快扭转。

## 二、通过结构性改革，重构货币金融和能源体系

上述分析表明，我们今天必须创立全球性管理模式。金融危机一旦过去，特权阶层就会企图回到原来的体制，让纳税人为这场金融危机买单，把担责任的帽子戴到各国政治领导人头上。他们希望把这场危机看成只是一场意外，一次青春期的发作，教人们学会自我克制。因此，各国政治领导人必须具有勇气和清醒的头脑，高瞻远瞩地去治“本”而不是单纯地治“标”。治本的途径有以下多种：

1、签订新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应该向未来的美国政府发出积极倡议。只有通过协商才能宣告

帝国的终结。这进一步说明，美国不应有下面这种想法，就是人们结成联盟去与它作对。新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不管在协商的范围还是在参与国方面，都将与原来的布雷顿森林协定有很大的不同。要协商的不是货币的平衡问题，而是货币、金融及能源总的平衡。这一协商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在世界各大地区之间关系基础上的全球性管理。这些地区可以建立自己的储备货币，相互间有固定汇率，并定期修订。在这些地区内部，由地区调控机构来逐步建立相当于当年我们欧洲的货币蛇形浮动线。欧盟、美国、中国和印度在这一机制中起关键作用。欧洲，最起码是欧洲大陆，应该团结一致，而不应象在七国集团里所表现的那样。

2、建立新的调节机制可以控制未来危机的范围。这些机制大家都已经想到。它们不能治本，但可以防止危机蔓延。主要有以下一些：

- 取消避税天堂。避税天堂只能让人见树不见林。避税天堂是大国进行间接税务倾销的手段。要做到确有成效，避税天堂的取消的同时，需要协商出一条共同的税收底线，最终要建立起全球性的税收规则。欧盟在这方面首先要作出榜样。

- 谨慎地制定与银行自有资本的新规则。这办法聊胜于无，但阻止不了银行在危机化解时无视危机的严重性的失控行为。

- 合法限制分解长期风险。分解长期风险会涉及到银行家职业本身的讨论（这清楚地意味着对金融派生产品的严格规定或禁止）。

- 限制利率争端。这是每次出现金融危机时的老生常谈，如将商业银行与存款银行严格分开（《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莱法案》已有有关规定，但并未能阻止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

- 金融界高层人士的刑事责任问题。连续发生的金融危机让人相信这一点：有这样一群经济领域的特权人士，他们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规范跟其他人不一样。金融机构的高层人士一方面获取其职位给予他们的丰厚收入，可另一方面却无法应对金融市场的复杂局面。要想重建人们对金融机构的信心，就要考虑金融机构的高层人士的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问题。安然事件发生后，在讨论《萨班斯-奥克斯莱法案》时，人们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这一次次贷危机，使这一问题的解决显得更为迫切。

3、以稳定能源成本实现货币稳定的策略。这就需要跟中东国家和俄罗斯协商。要稳定能源成本，意味着要设立调节性储备，只有这样，才能打击投机，约束主要化石能源生产国的讹诈，防止因自然灾害（如飓风卡特里娜）或政治危机（如伊拉克危机）而引发的能源生产的急剧波动。世界范围的主要农产品的调节性储备也同样应该设立。这些储备同时也可作为一种支付手段，成为那些支撑着世界国际贸易的跨国公司之间的记帐单位。

4、把可协商化石能源个人定额变成一种专门的货币。用同一种货币（记帐单位和支付手段）来支付劳动力和不可再生资源是十分荒谬的。若要重新推进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福利，包括就业机会，必须将劳动和能源两者剥离，因此要创立一种“向量货币”，在“电子钱包”时代这是可行的。这一货币中“能源”的形态必然是可协商个人定额。戈登·布朗内阁的外交大臣 David Miliband 还在担任环境部长时就已经对此有初步想法。这是凯恩斯理论中拉动需求的条件。

5、须重新审视经济和金融体制运转的内部逻辑。今天的一切，都促使人们急功近利，不负责任。金融体制的一切，使人目光短浅，缺乏责任感。光是依靠监控及道德力量解决不了问题。应该从深层着眼，改变思维。以下几点是需要改变的：

- 金融中介的收入模式。取消金融交易中的收费，这种收费只对金融中介有利。

- 金融中介业绩的评价模式。评价周期平均应在五年左右。

- 取消将企业高层跟其他员工隔离开来的“股票期权”。

- 股东的投票权。股东的投票权应在他们连续持股数年（三年）后才能授予。设想一下，我们会给那些刚踏入我国领土的旅游者以投票权吗？这一规则虽然简单，却可以使投机热情降温。家族式企业把事业是否能长久持续看得比短期效益重，这些企业在危机中能平安无事，难道是偶然的吗？

- 养老基金重新定向。养老基金自然倾向于长线效益，因此要用于向可持续社会的过渡。我们养老的唯一保障，是要有一个繁荣的地球。

6、货币多元化应该是我们的未来。货币首先是某一共同体内部交易的象征。欧元就是一个例证。各共同体创立各自的货币，在互联网发展很快及电子交易安全化的今天，已经成为可能。若不把富余和不足整合好，那将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一大丑闻。